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九十六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俄羅斯民族國家建構中 蒙古金帳汗國的影響

趙竹成 著

* 係個人研究，不代表機關立場 *

目 錄

壹、前 言	1
貳、直接的介入 - 俄國歷史進程的切換	2
參、間接的影響	6
肆、立陶宛 - 波蘭的衝擊	17
伍、莫斯科的自我改造	21
陸、結 語	24
參考書目	26
附錄一、俄國農奴制度發展及重要名詞簡表	30
附錄二、蒙古人在歐州（1223 - 1380）	33

俄羅斯民族國家建構中 蒙古金帳汗國的影響

壹、前言

「民族」的形成與分化，以及「民族」與「國家」兩者之間主、客體之間的變動關係，在民族學的研究的領域中向來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前者探討「民族」的出現、成熟、分裂的演化過程，後者則深究「民族」是由「國家」的政治性格所塑造或是，「國家」的出現與建立是因為「民族」的的內、外需要與要求。

「國家」是目前人類社會發展的最近階段，這種社會政治的複合體再加上「民族」的因素之後一般分成「民族國家」與「多民族國家」兩種形式。雖然在當代人類社會中很難找出「民族」與「國家」兩者界線相符的「民族國家」的標準模式，但是，對這個課題的研究除了可以說明「民族」與「國家」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外，在個案研究中還可以對單一國家的政治，文化及民族史的分析提供另一種不同的思考角度。

本文希望能透過這樣的角度對俄國歷史發展過程中莫斯科在推進俄羅斯民族國家的建構時，各種內、外的壓力與變化，尤其是蒙古金帳汗國的角色作初步的說明。

貳、直接的介入 - 俄國歷史進程的切換

自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俄羅斯不論其國體或是政體以何種形式出現，都對整個國際環境以及人類歷史發展過程展現出一定的影響力。

如果用編年體的原則，可以把俄國史劃分成不同世紀與年代；用系譜承嗣原則，可以將俄國史明顯的分為「留利克王朝」（Династия Рюриковичей，862-1612）和「羅曼諾夫王朝」（Династия Романовых，1613-1917）；或者，可以用社會經濟的眼光，讓俄國史演化出「聶伯河時期」（днепровский）以及「上伏爾加河時期」（верхневолжский）¹；而我們更可以從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來分析，看到俄國由「基輔羅斯」（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到「莫斯科大公國」（Московское 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由一個封建割據的社會進入到統一的民族國家的漫長歷程。這個歷程在俄國史上表現出一個重要的特質：它正與蒙古金帳汗國在俄羅斯的年代（1240-1480）緊緊的扣在一起，也就是俄國歷史傳統上被稱為「蒙古－韃靼壓迫」（Монголо-татарское иго）的時期。

-
1. 這種看法請參考：В.О.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1. //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1.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7, с.50-53

本文的目的不在探究蒙古金帳汗國與俄國在 240 年的時間裏彼此文化的相互影響，及這個過程是否在俄國文化中遺留下任何蛛絲馬跡的問題。這類問題誠如雅庫博夫斯基（А.Ю.Якубовский）所謂，是一個特別複雜和有趣的問題²。而文化做為一種社會生活的總體表現，隨著時空環境的轉換，以及社會結構的調整，文化的形式及內容也必然產生變化。因此，關於蒙古在俄國歷史上對俄國社會生活與文化的影響，似乎更適合，也提供了另一個研究金帳汗國史或是俄國史的切入點。而且事實上，已有不少學者特別針對蒙古在俄國的行政體系、社會生活、傳統習慣等層面作了初步的分析³。

我們首先試著把焦點放在俄國的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金帳汗國所扮演的角色。因為自十三世紀中葉開始，由於蒙古西征迫使俄國社會發展的核心由基輔所處的聶伯河流域移轉

2. Б.Д. 格列科夫, А.Ю. 雅庫博夫斯基, 金帳汗國興衰史, 余大鈞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5, 頁 217

3. 可參考: Б.Д. 格列科夫, А.Ю. 雅庫博夫斯基, 金帳汗國興衰史, 頁 207-217; G.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333-390; D.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J.Halperin,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到莫斯科所在的上伏爾加河流域，直到十五世紀下半葉，一方面俄羅斯剛成爲擁有統一政府，統一領導的國家，另一方面也是俄羅斯民族成形的時刻，就如馬夫羅金（В.В.Мавродин）所謂的，這是兩個相互制約、相伴產生的，在俄國史上最重要的過程⁴。這個俄羅斯統一國家及俄羅斯民族形成的結果，都是以「莫斯科公國」爲核心逐步凝結而來。雖然，莫斯科時期曾被形容爲俄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時代，最令人窒息，在外表上又最類似亞洲野蠻的形式⁵。但是，做爲一個由封建割據時期過渡到民族國家時期的轉折點，這種批評基本上並無損於「莫斯科公國」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甚至部份地說明了造成「莫斯科公國」國家性格的重要因素。

俄國歷史自862年歐列格（Олег，879-912）入據聶伯河（р. Днепр）邊的基輔（Киев）起即進入了「基輔羅斯時期」。直到1132年第16任基輔大公姆斯奇斯拉夫（Мстисла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076-1132）逝後，基輔羅斯開始了

4..В.В. 馬夫羅金，俄羅斯統一國家的形成。余大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頁2

5..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ЗАО «СВАРОГ и К», 1997, с.6-7

6.所謂「最長者」的任務是必須負責統籌一切以對抗外來侵略，並且決斷各公國之間的秩序運作。見 В.О.Ключеский,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курсы.//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х. Т.6, Москва:Мысль, 1989, с.100-101;Н.П.Ерошкин,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Вышая Школа, 1983, с.28

長期的封建割據時期。雖然基輔大公仍然被視為俄羅斯諸公之中的「最長者」（старейший брат）⁶，但是，已經分化出日後影響俄羅斯歷史走向的三個政治體：東北區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Владими́ро-Сузда́ль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西北區的「諾夫哥羅共和國」（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Феодаль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以及西南區的「加利西亞－沃林公國」（Галицкое-Волы́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1240年，蒙古西征部隊沿著俄國地理區上森林帶與草原帶的邊緣通過俄國的西南部，不但重創了「加利西亞－沃林公國」，也終結了基輔時代，使後來俄國歷史的發展出現南北兩線前進的現象。

南部、西南部成為立陶宛、波蘭天主教勢力和游牧部落競逐的場地，日後造就了烏克蘭、白俄羅斯民族歷史的基礎。而北部則以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為核心發展出幾個大俄羅斯民族文化上重要的公國，諸如「克斯特羅馬」（Кострома）、「特維爾」（Тверь）及「莫斯科」。

這種雙線演化的進程引發了東斯拉夫民族的分化，改寫了俄國史，更為今日俄羅斯、烏克蘭兩者之間的分歧埋下伏筆⁷。

除了民族分化的影響外，在俄羅斯傳統的政治體制安排上，原來基輔大公的地位也由「弗拉基米爾大公」所取代，被安排在金帳汗國的稅務「代理人制度」下運作。

7. 關於這部份請參考：趙竹成，蒙古西征與俄國歷史發展進程。// 成吉思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編印 86.6.頁 63-84

參、間接的影響

一、「代理人制度」的作用

蒙古金帳汗國在俄羅斯建立行政機制的最主要目的在於

時間	地 區	汗	大 公	記 載 來 源
1245	基輔切爾尼科夫	拔都	雅羅斯拉夫 II	蘇菲亞第一編年史 ⁸
1257	全境	別兒哥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	拉夫連齊耶夫編年史 ⁹
1262	全境	別兒哥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	皇室系譜 ¹⁰
1275	全境	蒙哥·鐵木耳	遲頓者瓦西里 (Василий Ярославич Квашня)	阿夫拉姆克編年史 ¹¹

8. Б.Д. 格列科夫, А.Ю. 雅庫博夫斯基, 金帳汗國興衰史, 頁 184

9. 前揭書 頁 184

10. В. Spuler, 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en in Russland. 1223-1502.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5, S.316. 「皇室系譜」(Степенная Книга) 記載著由留利克到伊凡 4 世各公之間彼此的承嗣關係。

11. В. Spuler, op. cit. S. 324

課稅，而課稅又必須先了解人口的結構。因此，金帳汗國在十三世紀後半葉曾對俄羅斯地區進行四次的人口普查。如下表：

這幾次的人口普查中，1257年是全蒙古帝國的一次調查，由大汗蒙哥親自下令進行。中國的《元史》及波斯的《史集》中都記載了此事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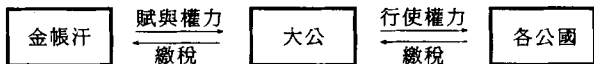
所謂的「代理人制度」是由金帳汗賦與俄羅斯諸公中一人「敕令」（ярлык）領「全俄羅斯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Всея Руси）頭銜，執行抽稅的任務。這個制度在1305年由特維爾公米哈伊爾（Михаил Ярославич Тверской）首領之後確立。在這以前，金帳汗國的課稅任務是由常駐在各地的「八思哈」（баскаки）執行。

「代理人制度」顯示出幾個重要意義。首先，金帳汗國在沒有改變原來俄羅斯地區傳統行政結構的原則下，透過大公執行管理課稅的工作。基本上，「公」的權力並沒有被取代或撤消，但是在「公」的上層又建立起一種代表金帳汗更高形式的權力¹³。在這種條件之下，金帳汗國對俄羅斯地區進行「羈縻」的色彩相當明顯。

第二，金帳汗，大公與各公國之間形成一種鎖鏈的結構性關係。如下圖示：

12 《元史》，卷三，憲宗本紀；Рашид-ад-Дин,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 Т.2, Москв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6, с.141

13 И.О.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2, с.41; С.Г.Пушкарёв,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Нью-Йор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мени Чехова, 1953, с.118



由這個鎖鍊結構可以明白地看出大公所處的樞紐地位。在政治上，其地位高於其它「公」的事實與意義和基輔時代比較之下沒有多少變動。但是它多出了一項基輔時代大公所沒有的優勢——在經濟事務上，可以透過「代理人」或是類似「捐客」的地位在金帳汗與各公國之間謀得利益。伊凡一世所以又會被稱為「錢袋」（Калита），主要的原因即是在這種「轉手」的過程中出現的附帶利益。而也就是藉著這種優勢所累積的財富，才使莫斯科在伊凡一世成為大公之初，能有「閒錢」（свободные денги）向私人、教會、修道院、大主教以及其它俄羅斯「公」購買土地，擴大了領地範圍到別洛傑爾斯克（Белозерск）、加里奇（Галич）以及烏格里其（Углич）一帶。¹⁴也使的莫斯科公國在「西蒙」（Семен Гордый, 1341-1353）與「瓦西里一世」（Василий 1 Дмитриевич, 1389-1425）時代有能力提供大量金錢給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紓困¹⁵。

14. И.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2, с. 16

15. В. Кожинов, Монгольская эпоха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и истинный смысл и значение Куликовской битвы.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 3, 1997, с. 185

因為「大公」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使的俄羅斯諸公之間爲了敕令的取得問題出現激烈的內鬨。索洛維約夫（С.М.Соловьев）曾評論道：「由此可知，在這裡同韃靼的關係與過去同波羅維赤人的關係是完全一致的，一個王公想要攻打另一人時，就到汗國去，就如以前到波羅維赤人那裏去會談一樣，並從韃靼人那裏僱來軍隊¹⁶」。這其中又以特維爾公以及莫斯科公之間互相競逐最著名。參見下表：

公	名	大 公 任 期
特維爾	米哈伊爾	1305-1317
莫斯科	尤利	1318-1322
特維爾	迪米特里	1322-1325
特維爾	亞歷山大	1325-1327
莫斯科	伊凡	1328-1340

俄羅斯地區由「大公」負責抽稅起自 1305 年，直到 1328 年以後才由莫斯科公獨占此頭銜。

還必須指出的是，除了收稅的能力以外，「效忠的程度」也是金帳汗在決定是否賦與敕令的考量之一。以第一個拿到敕令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爲例，雖然因爲 1240 年及 1242 年擊退瑞典人及條頓騎士團的入侵而在俄國史上被視爲民族英雄¹⁷，但是他和伊凡一世一樣，不能改變他們作爲代

16. Б.Д. 格列科夫, А.Ю. 雅庫博夫斯基, 金帳汗國興衰史, 頁 196
17. Жит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 // За землю Русскую. Памятн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1, с. 199-223

理人時，必須在金帳汗與俄羅斯之間扮演雙面人的角色，甚至要對俄羅斯內部進行鎮壓。衆所周知，伊凡一世在1327年特維爾的暴動中，依月即伯（Узбек）¹⁸汗的指示，率五萬軍隊對特維爾進行殘酷的鎮壓，保存莫斯科免受池魚之殃，以求換得敕令作為回報¹⁹。

但是「代理人」的制度無意中造成一種影響：它為俄羅斯諸王公之間在競爭「大公」頭銜時建立起了一種準則，而由金帳汗作最後的仲裁。就這個角度來看，「代理人」制度反而壓迫各公國之間的競爭達到秩序化－要競爭，就要在金帳汗國的遊戲規則之下進行。

而且克留切夫斯基特別指出：「汗」不只一次的制止了毀滅性的內鬪。²⁰在這裏我們看到「代理人」制度在俄羅斯諸王公之間產生的重要功能：直接造成俄羅斯內部既衝突又整合的政治矛盾現象，間接的確保金帳汗在此地區的權威地位。

18.此譯名係依《元史》之記載。

19. В.Кожин, там же. с.177; В.О.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2, с.20; С.М.Соловье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Сочинения, книга 2,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8, с.224; J.L.I.Fennell, The Tver' uprising of 1327: A Study of the sources.//Jahrbuecher fuer Geschichte Osteuropa.15 (1967), S.167

20. И.О.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2, с.41

整個代理人戰爭在 1328 年由莫斯科公伊凡一世取得之後才結束了與特維爾之間 23 年（1305-1328）的爭端，確立了莫斯科的政治地位。

二、教會機制的保存

以莫斯科為中心發動的民族國家統一過程，無論是主動或是被動開始，俄羅斯正教會一向站在莫斯科這一邊，強化了莫斯科在這個過程中的力量。但是，俄羅斯正教會的行為基礎不是建立在反蒙古金帳汗國的要求上，而是根基於莫斯科作為東正教世界中心的普世原則與彌賽亞意識。俄羅斯正教會所以能在未來成為整個東正教世界的核心，並在俄國文化與社會的發展過程裏扮演興滅繼絕的角色，蒙古金帳汗國具有關鍵的地位。

首先，根據蒙古習慣法，所有宗教一視同仁，神職人員都受保護。金帳汗國對俄羅斯正教會自然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1267 年金帳汗蒙哥·鐵木耳的敕令中准免教會、修道院、神職人員的各項稅賦，並明訂保護教會的各項財產，包括土地、水源、菜園、花園以及磨坊等。教堂不得被徵用作軍營，侵犯教會財產最重的懲罰是處以死刑²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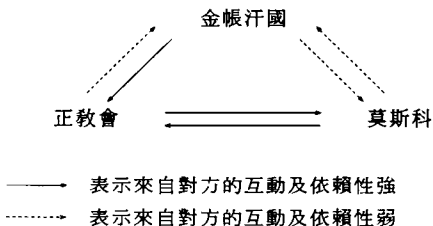
這種對宗教的禮遇與寬容使得金帳汗國在十四世紀以後，縱然已經伊斯蘭化，但是在首都薩萊（Сарай）的俄羅斯正教會主教區仍然運作到 1493 年以後。因此，在 1448 年

21. М. Д. Полубояринова,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в Золотой Орд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8, с. 23

以前，除了由部份的編年史中看到俄羅斯王公與金帳汗關於信仰差異的對話外²²，實在找不出明顯地可以作為反蒙古金帳汗國的意識形態²³。

再者，俄羅斯正教會薩萊教區主教似乎也會應金帳汗的要求穿梭於金帳汗國與拜占庭之間，例如，薩萊主教費岳格諾斯特（Феогност）在1279年就銜命代表金帳汗前往君士坦丁堡表示交好。²⁴

莫斯科、金帳汗國、正教會之間三角關係彼此在互動與依賴程度上的強弱不均現象，如下圖示：



22. М. В. Толсто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СПб.: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1991, с. 107-115

23. 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44-163

24. М. Д. Полубояринова,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в Золотой Орде., с. 24

正教會受金帳汗保護，但是彼此之間關係疏離；莫斯科一面向金帳汗取得代表資格以取得俗世地位，另一方面又極力拉攏正教會，正教會又未積極對抗金帳汗國，因為金帳汗國為正教會創造了宗教及經濟利益²⁵。

克魯姆 (Robert O. Crummer) 對莫斯科與正教會之間的雙邊關係作了很深刻的描述，他認為俄羅斯正教會必須藉助莫斯科的力量阻止立陶宛易教的企圖。而莫斯科更是著眼於掌握到「都主教」²⁶的支持，更能領導其它公國，並在未來與蒙古的鬥爭中得到合法化的藉口²⁷。所以，伊凡一世先

25. 蒙古時期正教會的修道院系統在規模和數量上都達到高度的發展。例如，沃洛科蘭姆修道院 (Волокол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就擁有 11 個農莊，24 個村。至於最有名的三一修道院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 及基利爾修道院 (Кирилло-Белозер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都是在這個時期創建並累積了大量的財富。教會在蒙古時期的角色事實上與封建領主差不多，甚至對後來農奴制度的發展要負部份責任。請參考：.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ех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9, с. 84-87

26. 「都主教」譯自 митрополит，源自希臘文 metropolitēs。正教會最高教階之一。東正教教區分為兩種，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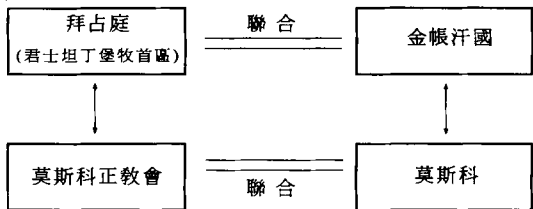
教區	牧首制 (патриархия)	大主教制 (архиепископия)
教階	牧首 (патриарх)	大主教 (архиепископ)
	都主教 (митрополит)	都主教 (митрополит)
	大主教 (архиепископ)	大主教 (архиепископ)
	主教 (епископ)	主教 (епископ)
備註	四級	三級

27. R.O.Crummer, The formation of Moscow, 1304-1613.,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87, p.40

爭取到「都主教」，彼得在 1326 年把教座由特維爾遷到莫斯科，再趁 1327 年特維爾的動亂一舉取得「大公」頭銜，替莫斯科的未來奠下堅實基礎²⁸。

前述克魯姆在分析正教會與莫斯科合作的原因中，除了說明立陶宛問題的壓力以外（這部份將在下一個單元作說明），俄羅斯正教會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區之間關係的變化也有很大的關聯性。

我們把金帳汗國、莫斯科和俄羅斯正教會的三邊關係再加上拜占庭因素後，可以看出四者之間成雙邊對立形式。如下圖示：



28 1308 年原為立沃夫（Львов）修道院院長的彼得初任都主教時就把教座由基輔經弗拉基米爾（Владимир）移駐特維爾。但與特維爾公米哈伊爾因為主教安德烈的免職問題在 1311 年產生尖銳對立。米哈伊爾指控彼得「聖職買賣」（симония）。為此正教會於同年召集了包括特維爾、羅斯托夫主教，各修道院院長、修士、司祭的會議以討論彼得的罪行問題。但是當時在莫斯科公丹尼爾的影響下彼得被認為無罪。也就由這時開始莫斯科與彼得之間建立起情誼。替伊凡一世邀請彼得將教座移往莫斯科奠下基礎。А.С. Хорош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ЧШ-ЧМШ в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6, с.93-95

中世紀時拜占庭帝國爲了抵禦西部教會及新興土耳其人的威脅，積極尋求金帳汗國的援助，並且透過聯姻的方法與金帳汗國間達到聯盟的目的。例如：金帳汗國的宗王諾該（Nogai）就娶了邁可八世（Michael VIII，1261-1282）的私生女歐弗洛思（Euphrosyne），月即伯汗的四個可敦（khaton）之中，排行第三的可敦是安德魯尼科斯三世（Andronicus III，1328-1341）的女兒巴雅倫（Bayalun）²⁹。

而在莫斯科推動兼併其它公國的同時，俄羅斯正教會也正不停嘗試自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獨立出來。

俄羅斯正教會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區之間的從屬關係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自 988 年接受東正教開始直到蒙古入侵的十二世紀下半葉。這個時期除了 1051 年及 1147 年兩次由俄羅斯自行選出伊拉里昂（Илларион）與克林瑪（Клима）爲「都主教」以外，都是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區派出，也就是由外邦人擔任俄羅斯教會的領袖。第二階段由十三世紀下半葉起到十五世紀下半葉。這段時間拜占庭受到土耳其人的壓力，特別是 1204 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摧殘君士坦丁堡使拜占庭國力日蹙，牧首區已無暇再兼顧俄羅斯正教區的人事問題，也不再對俄羅斯派出「都主教」，但是仍然堅持俄羅斯正教會「都主教」人選在選出之後必須赴君士坦丁堡取

29. Ф. Успенский, Византий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монголах и египетских мамлюках. // Византийский вестник. XXIV, 1923-26, с. 1;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p. 149, 357

得認可。最後，雙邊關係在 1439 年出現重要的變化。

1439 年的佛羅倫斯會議決議——東、西兩部教會的合併。但是這個決議引起俄羅斯正教會的反對，赴會的「都主教」伊西多（Исидор）被捕送主教會議受審，後逃往羅馬尋求庇護。而俄羅斯正教會則在 1448 年自行選出梁贊（Рязань）主教約拿（Иона）為「都主教」，成為自主教會，不再受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的控制³⁰。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產生出哪個正教會能接替君士坦丁堡牧首區延續東正教的問題。十五世紀末，在俄羅斯出現了「莫斯科—第三羅馬」的觀念。當時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長費洛菲（Филофей）致函伊凡三世時指出：「古老羅馬的教會落入不信神的異教徒手中，『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教會被阿加爾人（агаряне）³¹用斧頭砍破，而現在是第三個——『新的羅馬』。由你（指伊凡三世——著者）所支持的『新的羅馬』，是個在世間比太陽更耀眼的神聖使徒的教會，所有信仰東正教的王國都要環繞著你而成為統一的國度，你亦是世上基督徒的唯一沙皇，所有基督教國家亦將由你統一。兩個羅馬已陷落，而第三羅馬仍然屹立，也不會再有第四個。俄羅斯沙皇應該珍視唯一在世上東正教的遺產，

30. А. В. Карташе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 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1, с. 349-364

31 源自希伯來語 *hagar*，汎指阿拉伯的游牧部族，與中世紀西歐的薩拉森（*saraceni*）一詞同義。

不受破壞，直到基督第二次降臨³²」。這種強烈的信仰深深支配著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直到今天。

肆、立陶宛 - 波蘭的衝擊

但是，中世紀時對莫斯科推進民族國家的過程造成阻礙壓力的，並不單單是蒙古金帳汗國而已，我們還必須兼顧莫斯科週邊地區當時的國際環境，才會有比較整體的認識。

東歐地區在十四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的政治情況代表著兩種政治潮流的交盪。一是單一民族國家的形成，另一種是多民族國家的傳統政治力量。前者就是以立陶宛、莫斯科為代表。他們的活力更是當時東歐歷史發展的動力。也因此，當我們在檢視俄國國家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莫斯科公國時期時，就不得不注意立陶宛趁蒙古西征後俄羅斯南部的空虛的機會向東擴展時對俄羅斯造成的影響。因為立陶宛代表著另一種文化與政治集團，對俄國的國家與文化統一產生深遠的影響。格列科夫（И.Б.Греков）就認為，十四世紀以後俄羅斯土地的命運就取決於以莫斯科和維爾納（Вилна）為首的「弗拉基米爾大公國」與「立陶宛大公國」兩者的衝突結果³³。

32 .П.М.Милюк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3-х томах. Т.2, Вера, Творче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94, с.31

33 .И.Б.Греко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и упадок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на рубеже XIV-XV в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5, с.483

由十三世紀中葉開始，立陶宛開始向東擴展到俄羅斯地區。1245年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在出使蒙古途經烏克蘭地區時，就提到：「立陶宛人在他們可能的條件下，經常突然入侵俄羅斯地區，尤其是入侵我們必須經過的一些地方，所以我們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因為絕大部份俄羅斯人都被韃靼人殺害或者被俘而押解他鄉，基於這一原因，他們（指俄羅斯人）不能對這些侵略者（指立陶宛人）進行強有力的抵抗³⁴。」無疑的，立陶宛是利用烏克蘭地區在1240年蒙古征伐以後政治空虛之際深入。

立陶宛的東進是在「傑德敏大公（Gedimin, 1316-1341）時代」。而這個時期正是金帳汗國的月即伯汗（1313-1341）在位以及莫斯科公國在尤利（Юрий Данилович, 1317-1325）和伊凡一世（1328-1340）領導下初露崢嶸之際，這種巧合說明了當時東歐地區國際情勢的主軸以及立陶宛、莫斯科之間日後不斷的歷史糾葛的源頭³⁵。

衡諸立陶宛東進的策略，除了武裝入侵外，更利用俄羅斯諸公國的紛爭，伸展影響力在諾夫哥羅另立教座（Литовский митрополит с резиденцией в Новгороде），並另

34. 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耿昇、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86

35. Manfred Hellmann, Grundzuege der Geschichte Litauens und des Litauischen Volke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6, S.20

外在立沃夫（Львов）自建一個正教的自主教會³⁶。

尤其在1386年，立陶宛與波蘭在盧伯林（Lublin）正式合併成爲一個聯合王國。自此長達400年的時間裏，天主教文化源源不絕地在俄羅斯南部傳播，影響了烏克蘭歷史的走向，將東斯拉夫民族的發展推向另一個轉折點。克留切夫斯基（В.О.Ключевский）就曾形容當時莫斯科要面對的情勢：「俄羅斯被分裂成兩部份，西南部被立陶宛－波蘭聯合控制，而東北部則需付稅給金帳汗國³⁷」。由此可見，俄羅斯在出現民族國家的關鍵時刻最大的外來壓力反而是立陶宛與波蘭³⁸。因爲蒙古金帳汗國對俄羅斯諸公國的要求著眼在經濟利益，甚至可以委託俄羅斯王公收稅並依蒙古傳統刻意保護正教會。而立陶宛、波蘭的眼光放在土地的取得、政治版圖的擴充以及另種宗教信仰的傳佈，兩者之間對莫斯科施加壓力的大小自然會有清楚的比較。

莫斯科無非是在金帳汗國、立陶宛－波蘭及俄羅斯內部

36. И.Б.Грек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48-49

37. В.О.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2, с.100-101

38. там же. с.111; С.Ф.Платонов, Полный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Пб.: Кристалл, 1997, с.125

分裂的背景下開展其「民族國家」統一進程，由此也就不那麼難以理解，為何俄羅斯自伊凡四世（Иван Грозный，1533-1584）向東開發西伯利亞地區開始，以至俄羅斯帝國時代向西、向南的推進過程中帶有強烈的外向性格。

換另一個角度來看，莫斯科必須培養出兩項條件才能表現出它作為俄羅斯民族國家核心的優越性。首先，在客觀條件上，要用宗教上「精神的純潔性」去面對與外部異教徒的衝突，以達到心理意識上的一致。這也就是俄羅斯正教會在俄國民族統一事件裏的重要功能。1480年10月伊凡三世在猶豫是否與「大帳」（Большая Орда）³⁹的阿合馬（Ахмед）對峙時⁴⁰，羅斯托夫主教致函伊凡三世強調：「『大公』是基督徒的牧者，應該面對國家與信仰的敵人，『大公』的責任就是為基督徒戰鬥⁴¹」。這件事明白地顯示出俄羅斯正教會對莫斯科的期待與支持。但是在客觀的條件為莫斯科培養出有利環境的同時，也必須有主觀條件的配合，也就是在下節中將談到的第二項條件：莫斯科的內部機制必須作調整以展現出比其他公國更能做有效的動員。

³⁹約於1466年自金帳汗國分裂出來的汗國直到1502年。

⁴⁰此即有名的烏格拉河的對峙（Стояние на Угре）。此役後，俄羅斯被視為徹底結束了蒙古—韃靼時代。

⁴¹M. Cherniavsky, *Khan or Basileus: An Aspect of Russia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20, 1959, p.472

伍、莫斯科的自我改造

莫斯科公國所以能夠興起，在於莫斯科本身優越的先天地理條件，使莫斯科在整個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地區的各公國間擁有商業貿易及國家安全的優勢。關於這點，克留切夫斯基、索羅維約夫（С.М.Соловьев）及普拉托諾夫（С.Ф.Платонов）三人的看法相當一致⁴²。但是，面對前述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特別是蒙古金帳汗國亦正亦反的影響力，莫斯科該如何去因應這種局勢成爲一個重大的挑戰。這個過程是以莫斯科公國內部機制上的改變爲開端。

首先，自基輔羅斯時代以來，講求氏族統一性的概念自十四世紀初被打破，不再把土地及國家視作全留利克家族的共同財產。由於這項觀念的出現，權力及財產的繼承確立了「父傳子」的模式，結束了長幼爭序的困擾，而且不再裂土分封，改以領地世襲爲原則，王權的中心得到確立。隨著王權中心的確立，莫斯科公國和領地貴族之間則以文字形式確認彼此之間的權力與義務關係⁴³。這種繼承原則的確立和同

42. В.О.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2, с.8-13; С.Ф.Платонов, Полный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159-163; С.М.Соловьев, Об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2, с.177-178

43. В.О.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2, с.28-31, 112 С.Ф.Платонов, Полный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 124; С.М.Соловьев, Об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й России. с.179-180

時代同地區的其他公國比較之下出現兩個優勢：第一是可以降低王位繼承過程中內部紛爭的風險；第二則利於走向中央集權，有效整合國家資源。因此，當其他公國因為不斷地封建過程，導致國家規模日小，內部分裂風險日高之際，莫斯科反而向外不斷兼併以擴充規模。而且，小公國的不斷分裂也正同時意謂著莫斯科向外擴張要面對風險的降低，事實上正好造就了俄羅斯在莫斯科主導下統一的機會⁴⁴。

接著我們觀察到的是經濟結構體的改變。雖然一般都以1497年伊凡三世頒佈「法典」(Судебник)這一年作為俄國農奴制度的起點，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農奴制度作為俄國社會四百年的根本基礎，必然經過一段非常長時期的演化才能成形⁴⁵。1497年的「法典」應該被視為是農奴制度法律化的開端。而這個法律化過程，持續了152年歷經兩個王朝在1649年沙皇亞列克謝伊(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頒佈的「法典集」(Соборное уложение)中完成。因此，俄國社會中階級關係的分化必然早於1497年。

俄國自1450年代開始已經有勞動人口隨著財產在教會系統和政治系統之間轉移的現象。例如1455至1462年，三一修道院就把部份土地及人口移轉到貴族和莫斯科公瓦西里二

44. В. А. Кучкин,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Руси в X-XIV в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с. 316-317

45. 關於俄國農奴制度的演變請參考附錄一

世（Василий 11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емный, 1425-1462）手中⁴⁶。而當時賣身奴（кабальные холопы）做爲半自由的僱農（закупы）身份也已出現。1481年伊凡三世致其弟小安德烈（Андрей Меньший）的詔書中就有提到「被買的」，「家奴」等字眼⁴⁷。

這種社會階級關係的定制正好改變莫斯科公國的軍事體系。以往公國武裝力量依靠的是「公」的親兵（дружина），但是親兵在階級制度下轉型成爲貴族後，在量與質的層次上皆不足以應付規模、次數日漸擴大的對外、對內戰爭的要求。因此利用貴族領有的居民和教會所有的農民來組織軍隊，成爲一種不得不然的選擇，而且在後來莫斯科也證明這種新結構的體系更能適應大規模的戰爭⁴⁸。

至此，莫斯科在推動民族國家過程的各項條件接近成熟。

46. J. M. Culpepper, *The Legislative origins of Peasant Bondage in Muscovy*. // *Forschungen zur Osteuropaischen Geschichte*. 14 (1969), S. 163

47.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 России*. //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 8,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90, с. 129-130.

賣身奴指的是原來是自由人但是無力還債而委身債權人爲奴者。

48. С. М. Соловьев, *Об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й России*. с. 183-184

陸、結 語

俄羅斯國家建構的過程充滿著內、外巨大的壓力。這個過程又與蒙古金帳汗國的時期重疊，在以往，俄羅斯帝國以及蘇聯時代對於金帳汗國的角色基本上充滿誤解以及各種負面的評價。⁴⁹但是事實上，我們初步可以看出金帳汗國在俄國國家建構過中所造成的一些影響。第一、是直接的介入。蒙古的西征將俄國歷史的發展方向作了一個巨大的扭轉，讓莫斯科有機會取代基輔把俄羅斯引向另一個方向。並且透過與其它東斯拉夫人的地域分隔，國家的統一，領土的擴張，與蒙古金帳汗國、立陶宛－波蘭的對抗，而促成了「大俄羅斯人」的意識與實體。

第二、與此事件的同時，金帳汗國間接地為立陶宛、波蘭開闢了在俄國南部發展的空間，天主教信仰與文化的引進再加上俄羅斯南部與北部的分線演化，為斯拉夫民族的分化增加了可能性，也是後來在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歷史、政治意識分歧的開端。

第三、依蒙古習慣法對俄羅斯正教會的保護，一方面使俄國傳統文化甚至經濟規模能在教會修道院中保存下來，並為後來莫斯科的對外、對內戰爭提供心理及物質上的支援。再者，金帳汗國的保護促使俄羅斯正教會在 1453 年君士坦丁

⁴⁹基本觀點可參考：Б.Д. 格列科夫，А.Ю. 雅庫博夫斯基，金帳汗國興衰史，頁 207-217

堡牧首區陷落後一躍成爲東正教世界的領袖，並發展出「第三羅馬」的概念，深深影響俄國的國家意識。

第四、透過「羈縻」的形式與「代理人制度」的確立，使莫斯科有機會在俄國各公國間成爲經濟和政治地位的領袖，而這無疑是莫斯科成功的基本條件。金帳汗國在這 240 年的時間裏完全表現出其在俄國政治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催化作用。

最後要說明的是，金帳汗國與俄羅斯 240 年的互動只是一種方便的說法，因爲民族之間的互動過程不能也無法用數字、年代或是任何人爲手段去切斷或是刻意忽視。彼此之間也沒有絕對在意識形態上正確或錯誤的對立。曾有俄國學者統計出俄羅斯民族的姓氏中，有 500 個姓氏是源自金帳汗國統治下的少數民族，並在俄國歷史發展中，從文學、軍事、政治各種不同領域裏，爲俄國文化的豐富性作出貢獻⁵⁰。它顯示出一個事實，無論歷史學家花多少篇幅說明不同民族間的互動關係，都永遠落在事實的後面。因爲，不同民族間的互動既不會停止，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阻止它向前推進。

50. А.Х.Халиков, 500 русских фамилий булгаро-татарс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Казань:Казань, 1992

參考書目

1. 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耿昇、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85，348頁
2. 格列科夫,Б.Д.，雅庫博夫斯基,А.Ю.，金帳汗國興衰史，余大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411頁
3. 馬夫羅金,В.В.，俄羅斯統一國家的形成。余大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383頁
4. 趙竹成，蒙古西征與俄國歷史發展進程。// 成吉思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編印 86.6.頁 63-84
5. Cherniavsky, M., Khan or Basileus: An Aspect of Russia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ry.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20, 1959, pp.459-476
6. Crummer, R.O., The formation of Moscovy, 1304-1613.,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87, -275p.
7. Culpepper, J.M., The Legislative origins of Peasant Bondage in Muscovy.// Forschungen zur Osteuropaischen Geschichte. 14(1969), S.162-237
8. Fennell, J.L.I., The Tver' uprising of 1327: A Study of the sources.// Jahrbuecher fuer Geschichte Osteuropa. 15(1967), S.161-179
9. Halperin, C.J.,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80 p.
10. Hellmann, Manfred, Grundzuege der Geschichte

- Litauens und des Litauischen Volkes. Darmstadt :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66,-179 S.
11.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1325-1354.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398 p.
 12. Ostrowski, D.,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329 p.
 13. Spuler, B., 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en in Russland.1223-1502.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1965,-638 S.
 14. Vernadsky, G.,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461 p.
 15.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 ЗАО «СВАРОГ и К», 1997,-541 с.
 16. Греков, И. Б.,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374 с.
 17. Греков, И. Б.,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и упадок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на рубеже XIV-XV в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5,-516 с.
 18. Ерошкин, Н. П.,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3,-352 с.
 19. За землю Русскую. Памятн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I-XV веков.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1,-520 с.

- 20.Карташев,А.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 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1,-704 с.
21. Ключевский,В.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1.//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1.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7,-430 с.
22. Ключевский,В.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2.//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1.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8,-447 с.
- 23.Ключевский,В.О.,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курсы.//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6, Москва:Мысль, 1989,-476 с.
24. Ключевский,В.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 Росси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8, Москва:Мысль, 1990, -445 с.
- 25.Кожин,В., Монгольская эпоха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и истинный смысл и значение Куликовской битвы.//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3,1997,с.176-198; №.4,1997,с.245-250
- 26.Кучкин,В.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Руси в X-XIV вв.. 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89,-352 с.
- 27.Милюков,П.М.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3-х томах. Т.2, Вера,Творчест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94,-496 с.

28. Платонов, С.Ф., Полный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Пб.:Кристалл, 1997, -838 с.
29. Полубояринова, М.Д.,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в Золотой Орде.,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8,-131 с.
30. Рашид-ад-Дин,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 Т.2, Москва и 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6,-248 с.
31.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вехи истори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9,-719 с.
32. Соловьев,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Сочинения , книга 2,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8,-765 с.
- 33.Соловьев,С.М., Об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2,-544 с.
34. Толстой,М.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СПб.: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1991,-736 с.
- 35.Халиков,А.Х., 500 русских фамилий болгаро-татарс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Казань: Казань, 1992,-192 с.
- 36.Хорошев,А.С.,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анонизации: XI-XVI в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6,-206 с.
- 37.Успенский,Ф., Византий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монголах и египетских мамлюках.// Византийский вестник. XXIV,1923-26,с.1-16

附錄一、俄國農奴制度發展及重要名詞簡表

時代	重要名詞	說	明	備	註
十 二	佃農 (смерды)	平民階級之一。雖然屬於自由人，但是民法上的權力受到限制。例如，死後如無直系繼承人則遺產由「公」收歸。殺死一個 смерд 的補償金和 холоп 相同皆為 5 гривен ⁵¹ 。Смерд 因債務關係而變成 холоп。			
	債農 (закупы)	因借貸關係而出現的半自由農民，附屬於封建領主之下，向領主取得工具並且必須在領主的田地上耕作，但是被允許擁有私有的小型耕地。不同於 холоп，其人身安全受到保護，清償後可回復自由的身份，離開領主自行經營農事，與領主之間發生糾紛時可向公提出告訴。但是若在未成為自由人以前脫離領主而被抓回後則降為奴隸，不得再成為自由人。			
世 紀	和洛普 (холопы)	10-18 世紀的封建附屬階級，類似奴隸 (рабы)。名詞最早出現於 980 年。11-12 世紀意同於 рабы。主人可對 холопы 殺害，典當、販賣。但是 холопы 若有侮慢它人及偷竊行為時主人亦負連帶責任。холопы 來源為戰俘，賣身者，典當自身者、罪犯以及嫁給 холопы 的女子。15 世紀末，холопы 轉化成家僕 (челяди)，大部份除了仍從事農耕以外，也進行手工製造，管理以及充員當兵。16 世紀因為其它農民的引進使得 холопы 在農作上的比重改變，使其地位開使上升。17 世紀初出現了擁有私人耕地但須付稅給領主的 холопы。也有成為貴族的 холопы。			

51. гривна，古俄羅斯的貨幣單位，約為 204 公克銀錠。

時代	重要名詞	說	明備	註
十五世紀	尤利日 (Юрьев день)	俄曆 11 月 6 日。		原為教會慶祝聖喬治的節日。但是因為節日在秋天，因此古代羅斯以這一天作為一年農事的循環起點。以當日為收穫計算基準點並應付多少稅給政府。並且這一天作為農民隸屬改變的基準日。
中	禁制期 (Заповедные лета)	11-17 世紀時在古代羅斯基本上農民可以自由移轉，稱為 Выход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但是部份地區則限定在某個期限內禁止移轉。		
1497	法典 (Судебник)	1. 限制農民移轉時間為 Юрьев день 的前後各一星期。2. 移轉之農民必須付賠償金給原地主。	伊凡 III 世	
1550	法典 Судебник (Царский Судебник)	1. 確認 1497 年關於農民移轉的規定。2. 確定 посадных 的奴隸地位以及 крестьян 的身份同於前者。3. 確立領主對農民施以刑罰的權力。	伊凡 IV 世	
1597 /11 /24	追捕期 (Урочные лета)	1. 完全取消 Заповедные лета 。2. 定立 5 年追捕期限。 2- 1. 1607 年延長為 15 年 2- 2. 1639 年改為 9 年 2- 3. 1642 年改為：自逃者 10 年，由自逃者帶走或被其它人放走者 15 年。	費奧多(Федор Ицанович)	

時代	重要名詞	說	明	備註
1607		1. 追捕期限 15 年 2. 禁止其它領主收納逃走者，違者付罰款給政府及賠償金給舊主人。		舒斯基(Василий Шуйский)
1649	法典集 (Соборное уложение)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所頒。1. 確定 1626 年的 Писцовые книги 以及 1646-47 年的 Переписные книги 的法律地位。 2. 取消追捕期限。但是逃出國境線 (pfctxyfz xthfnf) 者，其期限另定。 3. 追捕費用概由國庫支應。 4. 收納逃脫農民的領主加負刑事責任。		俄國自 1581 年起對全國進行土地及人口登記，列造成冊。前述兩種清冊登記了都市及農村人口各人名字以及農村中領主與農民的隸屬關係。
十七世紀下半葉		1. 允許可將幼童帶進王室及貴族家庭； 2. 禁止農民在城市或鄉村擁有不動產 3. 禁止農民進入工業部門工作 4. 根據 1675、1682、1688 各年的詔令 (Указ) 農民可不依土地價格而依各人條件出售。 5. 允許領主對農民行笞刑、上枷鎖。		
十八世紀上半葉	人口普查 (ревизия)	與 перепись 同義。普查後建立人頭稅冊，人頭稅概依清冊所列人頭、稅金繳納，稱為 ревизская душа。不論死活，直到下一次普查，故有死魂靈 (мертвая душа) 一詞。自 1741 年起行專有化，農民所有之動產亦屬領主所有。		
十八世紀下半葉		1. 1760 年的 Указ 賦予領主自行流放家僕及農民到西伯利亞的權力，1765 年增加判為苦役的權力，1775 年可自行送入監獄。 2. 1766 年除了政府公告招募新兵的前三個月以外，農民不論老幼可自由買賣； 3. 1760 年允許將小孩、成人分開買賣 4. 1771 年行拍賣制 5. 除了虐待致死外，領主不負任何責任。 6. 18 世紀末烏克蘭地區亦實施農奴制。		烏克蘭於 1654 年 1 月 8 日與俄羅斯統一。

附錄二、蒙古人在歐洲 (1223-1380)

摘自：Riasanovsky, N. V.,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p.74

